



张黎群 张定 严如平 唐非 李公天◎主编 严如平◎撰

胡耀邦

(1915—1989)

第二卷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胡耀邦

(1915—1989)

第二卷

张黎群 张定 严如平 唐非 李公天◎主编

严如平◎撰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1981年6月，胡耀邦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



胡耀邦在共青团十大筹备会上讲话（1978年）。



大力拨乱反正，深得党心民心。在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



彭德怀、陶铸同志追悼会现场（1978年12月）。

目录

第十二章 “文革”磨难.....	389
一、飞来横祸 / 389	
二、改组之后 / 397	
三、“牛棚”囚禁 / 404	
四、“发配”黄湖 / 410	
五、幽居的日子 / 419	
第十三章 整顿科学院.....	424
一、再试身手 / 424	
二、起草《汇报提纲》 / 436	
三、苦心经营 / 440	
四、又被打倒 / 446	
第十四章 在中央党校拨乱反正.....	453
一、“中兴伟业 人心为上” / 453	

- 二、停止“批邓”，揭批“四人帮”和康生 / 456
- 三、在全国形成平反冤假错案的舆论 / 458
- 四、“十二级台风面前要挺住” / 464
- 五、以实践标准检验“文革” / 466
- 六、创办《理论动态》 / 470
- 七、一个“阵地” 一个“模范” / 477

第十五章 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 482

- 一、组织部要办成“党员、干部之家” / 482
- 二、敞开大门，热情接待来访 / 485
- 三、要恢复干部的工作权利 / 489
- 四、一个“干部师”走上四化前线 / 491

第十六章 平反冤假错案..... 497

- 一、以“两个不管”抵制“两个凡是” / 497
- 二、突破“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 506
- 三、撤销“中央专案组” / 512
- 四、研究“右派”改正问题 / 514
- 五、拉开改正“右派”的帷幕 / 517
- 六、“错了的都要改正” / 522
- 七、刘少奇等案的平反 / 526
- 八、让阳光消融冻雪 / 529

第十七章 真理标准大讨论..... 536

- 一、审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536
- 二、邓小平等的领导和推动 / 542

- 三、真理标准讨论向深入开展 / 550
- 四、三中全会高度评价真理标准讨论 / 555

第十八章 中央领导层的更新..... 562

- 一、中央工作会议 / 562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 / 576
- 三、进入中央领导层 / 581
- 四、坚持集体领导 / 585
- 五、健全各级领导班子 / 592
- 六、努力推进新老交替 / 594

第十九章 理论工作务虚会..... 610

- 一、贯彻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 / 610
- 二、突破禁区，直指“左”倾错误 / 615
- 三、敞开思想，深入探讨重大理论问题 / 617
- 四、推动解放思想和发扬民主 / 623
- 五、“四个坚持” / 625
- 六、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继续深入和“补课” / 630

第二十章 总结三十年历史经验..... 635

- 一、“回避不了的大事情” / 635
- 二、“把功绩说够，把错误说透” / 640
- 三、起草历史决议 / 647
- 四、揭示三十年历史 / 653

第二十一章 十二大开创新局面..... 658

- 一、十二大的主题 / 658
- 二、二十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 660
- 三、坚持改革开放 / 661
- 四、党必须在宪法范围内活动 / 664
- 五、一批新人进入中央委员会 / 666

第二十二章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672

- 一、“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不适用了” / 672
- 二、把知识分子政策落到实处 / 677
- 三、知识分子的知己 / 685
- 四、为统战对象落实政策不能含糊 / 689
- 五、“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 692
- 六、期盼国共第三次合作 / 697

第二十三章 繁荣新时期的文艺创作 701

- 一、办好“服务站” / 701
- 二、总结经验，拨乱反正 / 707
- 三、繁荣创作要排除“左”的障碍 / 712

第二十四章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 723

- 一、排除“左”的干扰 反对封建残余 / 723
- 二、努力探索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 / 726
- 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 / 732

第十二章 “文革”磨难

一、飞来横祸

胡耀邦在 1965 年 6 月回到北京养病，生活是平静的，而思想却极不平静。主政陕西二百天里的种种重大是非问题，无时不在头脑里映现。离开陕西以后，那里还在批判他，而且调子越来越高，这消息他早已知道了。从那里拉开的架势看，他很清楚事情不仅不会就此结束，而且还会发展。他要向中央申诉。他把当时的文件，包括他自己的历次讲话细细看过，经过一再地重新估量，仍然认为自己在这二百天里的言论和举措，是经得起检验的。他着手准备一篇长篇发言，阐明自己那些政策主张的依据，驳斥对他的那些荒谬的批判，在适当的机会，当面向中央领导同志陈述。

10 月初，胡耀邦得到中央通知：西北局书记处和陕西省委书记处的部分成员正在北京参加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中央工作会议，10 月 6 日，由中央书记处主持，请他们来谈双方的争论，请胡耀

邦出席。

10月6日，胡耀邦带着厚厚一摞材料来到中南海，走进会议室，他看到只有邓小平一个人坐在那里，尤其使他大感意外的是，邓小平告诉他：“你们的争论摆下，不要谈了。你不要回陕西去了，休息一段时间，另外分配工作。”邓小平还告诉他，中央已派浙江省委书记霍士廉去接替他的工作。胡耀邦提出：“中央是否给我做个结论？”邓小平说：“没有必要。”胡耀邦说：“他们写的《省委一百二十八次常委（扩大）会议纪要》已经发下去了，还要在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中肃清我的‘流毒’呢。”邓小平说：“他们说的不算，中央没有给你作结论。”胡耀邦又提出：“是否把总书记今天讲的这几点形成一个文件发下去？”邓小平又说：“没有必要。”

不久，就有比个人际遇更重大的社会动向引起他的注意。11月间，报纸上发表了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点名批判了《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说这个剧本是“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剧中写的“退田”“平冤狱”就是鼓吹“单干风”“翻案风”。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声望卓著的民主人士。现在竟然这样点名批判，而且文章杀气腾腾，显然有极不寻常的背景。胡耀邦知道，学习海瑞，正是毛泽东提出来的。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讲真话，敢于批判他的缺点，要向明朝那个敢于痛骂嘉靖皇帝的海瑞学习。吴晗正是按照毛泽东倡导的精神，撰写文章，编写剧本的。如今，海瑞又成了“影射现实”的典型。

回想起这一年来思想领域里一场又一场的批判，都给人以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上批道：“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又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①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又批道：“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②继这连续两次尖刻批判以后，康生就大肆施展罗织罪名的手段，在文艺界掀起了批判“老子”“祖师爷”的狂潮，接连不断地批判了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齐燕铭这些文化界、文艺界的代表人物，与此同时，又批判了《早春二月》《谢瑶环》等等一大批作品。以后，很快又扩展到其他领域，哲学界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和企业利润观，史学界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以及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让步政策”等等。这些所谓“批判”，都不是着眼于学术观点或艺术观点，而是用强加的政治罪名，要一举置人于死地。这种社会气候，使胡耀邦产生一种压抑感。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36、437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而这时更令胡耀邦吃惊的是，他敬重的好友罗瑞卿突然被定为机会主义分子而被隔离审查。

在延安抗大期间，胡耀邦在罗瑞卿直接领导下工作，两人结下了友谊。以后在晋察冀野战军两人又在同一部队，相知甚深。新中国成立以后，罗瑞卿被授予大将军衔，在党、政府、军队里都担任要职，具有卓著的声望。胡耀邦同他虽各有所忙，但还是时有过从，遇有大事每每向“罗大将”请教，罗瑞卿暇时也到胡耀邦家里来打打麻将、聊聊天。在林彪提出“突出政治”等口号之后，性格耿直刚烈的罗瑞卿表示了疑问和不同意见，1965年11月，林彪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要夺取军权。毛泽东当即批示：“那些不相信政治，对于突出政治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①这样一来，罗瑞卿随即被隔离审查。当胡耀邦读到中共中央批转的审查材料，看到其中列举的罗瑞卿“极端敌视毛泽东思想”等罪名时，真是百思莫解。他无法相信，像罗瑞卿这样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对党、对人民、对毛泽东赤胆忠心、功勋赫赫的大将军，居然会反党、反毛泽东思想，而这一切，又都是缘于对林彪那一套有不同意见。这样不正常的现象，使胡耀邦感到深深的忧虑。

进入1966年，一切一切都预示着，那场疾风引来的暴雨，就要出现了。先是由批判吴晗演变到批判“三家村”，毛泽东又借此严厉批评了彭真领导起草的《二月提纲》，接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生拉硬扯地联在一起，定为“反党集团”加以揪斗。演变到后来，就是中共中央于5月16日发出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86页。

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其中有一段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在这同时，成立了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一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此发动。

最早起来响应的是北京的大中学生。5月下旬，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即后来所说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说“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6月1日，他下令公开发表这份大字报，要使之成为一个突破口，以大大发动群众，打破原有秩序。果然，学生们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铺天盖地、乱加罪名的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学校党和行政领导人和教师，甚至施行体罚和种种污辱，党的组织很快陷于瘫痪，学校已难以进行正常的教学和各项工作。

这时毛泽东出外巡视。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认为这种混乱局面必须制止。6月3日，他们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革命。会上决定北京市中学的“文化大革命”归团中央负责，立即派工作组进驻。

团中央由此惹上了大祸。

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克实列席了这次会议，回来立即召开书记处会议汇报。胡耀邦面有难色，觉得事情复杂，深浅莫测，但

既然是中央的决定，那就要执行。胡克实主持召开了书记处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的决定，立即成立领导小组和“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团长、副团长分别由胡克实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惠庶昌担任。随后，抽调了团中央机关六十多名干部，同中共北京市委干部一起，组成十六个工作组，进驻“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掀起、局面混乱不堪的北师大女附中、清华大学附中、北京四中等十六所中学。其后又从北京和全国各地抽调一千八百多名团干部，组成三百多个工作组，陆续向北京市八个区的中学派出，并在各区成立了工作队，队长由团中央书记、常委、部长担任，工作队具体领导各工作组。

但工作组不曾料到，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关锋、戚本禹之流，却在暗中煽动学生反对工作组，因此工作组一进校，就遭到围攻。6月17日，北京师大女附中贴出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紧接着清华附中红卫兵同工作组发生了冲突，他们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信，控告工作组进校后压制造反派，搞折中主义，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火药味不浓等等，表示公开反对。

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撤销工作组，“文化革命”由群众自己来主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7月28日，改组后的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并说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从此，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更是气焰万丈地四处煽风点火，制造一起又一起学生同工作组严重对立的事件。7月27、28日，江青派人出席了海淀区、西城区中学师生代表大会，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宣布工作队要求学生复课是压制红卫兵，撤了这两个工作队队长周杰、胡启立的职务，并且对

他们进行了批斗。这样，就在北京掀起了一股各校学生驱赶殴打工作组的武斗邪风。

一直居家养病的胡耀邦没有参与工作团的工作，但学生们的所谓“造反”行动使他深感不安。他支持工作组进驻学校去稳定秩序，当听说两个工作队挨了批斗，工作组被赶出学校时，他气愤地说：“派工作组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做法很不正常。”他要胡克实把这些情况向邓小平反映。

胡耀邦还不知道，邓小平的处境也很困难。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万人大会，宣读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会上讲话，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并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当天晚上，北京石油学院附中等八所学校的红卫兵涌到团中央机关“造反”。他们刷标语，喊口号，声讨派工作组的“罪行”，四处寻找工作组成员批斗。

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偕同关锋、戚本禹等来到团中央，表示支持石油学院附中等八校“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他们咄咄逼人地指责胡耀邦、胡克实等“害怕革命、害怕青年、害怕群众”。

从此，一部分红卫兵就据守团中央不走，天天“造反”。他们找到了团中央候补书记、西城区工作队队长胡启立，立即在传达室将他团团围住，不容分说地把盛满污水的痰盂扣在他头上。经过撕扯、推搡、责骂的痛快淋漓的“批斗”之后，才开心而去。

几天来的突然变化，使得团中央内一片惶恐。胡耀邦和胡克实心情复杂，他们一方面想不通，不服气，一方面也疑虑百端，惴惴不安，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哪一步。